

# 革命史學與中國革命

● 蔣賢斌



德里克 (Arif Dirlik) 著，翁賀凱譯：《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1927年，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從事的革命政治運動，因「四·一二」政變而陷入低潮，但這並不意味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受挫，相反，這一年卻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社會科學領域取得「話語權」的開始。而這個「開始」是始於「史學」的——

1927年始的「中國社會性質及中國社會史論戰」，標誌着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成為中國歷史學的基本「範式」。

這一結論是從德里克 (Arif Dirlik) 的《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以下簡稱《革命與歷史》，凡引此書只註頁碼) 一書中得出來的。該書於1978年在美國的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2005年1月，由翁賀凱翻譯的中譯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直接引發了「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和「中國社會史論戰」。國內對這兩次論戰的研究較早，在1935年，論戰還在進行當中，郭湛波著的《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再版時改為《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 就已列出章節進行論述了；1937年，何幹之先生又出版了《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和《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兩本專題研究的小冊子，這兩本小冊子是最早研究這兩次論戰的專著，也是至今最有份量的研究成果之一；在1949年以後到1980年代以前，國內對這兩個主題進行研究並產生較大影響的應該算是李澤厚的〈記中國現代三次學術論戰〉。

《革命與歷史》這本書是為英語世界的學術思想界服務的；這就決定了它必須對「中國社會史論戰」作清晰的梳理。這本書寫於冷戰時期，當時美國中國學所關注的最大問題就是：共產主義為何能在中國取得勝利？該書的研究也圍繞着這一中心問題。

20年代中期，自由主義和激進的知識份子都關注社會問題，並形成了以下共識：即社會變革應該是政治變革的前提。這促使中國思想界發生了社會學的轉向，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唯物史觀通過「社會學」這一「媒介」得到了廣泛傳播，形成了知識份子所共同認可的共用知識。

這一次發生在中國現代思想學術史上的論戰（由於兩次論戰互相交差難分彼此，可以視為一次論戰，在國內學術界往往會用「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來統稱），由於它的論戰起因明朗、參與論戰的各方態度清晰、論戰的資料又保存齊全完備，這在客觀上就造成了關於這一論戰的研究難度加大。這是學術研究中的一種悖論：一個研究課題的資料愈清晰、愈多，這一課題的研究難度愈大。原因很簡單，在相同的資料面前，前人的研究成果具有「永恆性」，後人就難有突破了。具體到這一論戰來說，何幹之1937年得出的結論具有「永恆的有效性」。既然這一論戰的空間不大，中國幾代學人又對此問題都有研究，那麼，德里克的論著有甚麼新意呢？

在討論之前我們必須先明晰兩個問題：一是這本書是為英語世界的學術思想界服務的。這就決定了該書必須對「中國社會史論戰」作一個清晰的梳理，顯然，作者在這方面是做得比較好的；二是它寫作及出版的時代是在冷戰時期。

冷戰期間，美國中國學所關注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共產主義為何能在中國取得勝利？這本書的研究同樣也朝着這一問題而去的。正如前面所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實際上是從中國史學領域開始的，那麼，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何以會在中國史學界取得勝利並成為中國史學的「範式」呢？圍繞這個問題意識的探討就形成了德里克這本書的一大特徵。相比較而言，國內學者的研究主要是關注論戰中的三派——代表國民黨反對派（或叫國民黨激進派）的「新生命派」、代表

中國共產黨的「新思潮派」和代表托派的「動力派」的觀點是甚麼，進而得出代表「真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思潮派」獲勝這一結論。德里克對論戰的三派觀點同樣也用了相當篇幅進行說明，但他更關注的是何以論戰的各派都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自己的分析研究的工具？當論戰的各方都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工具時，這已清楚表明：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即唯物史觀已成為各方的共識，也就是說成為了這一學術領域的並新「範式」。那麼，這個共識是如何形成的呢？

德里克主要是從學術知識傳播與轉向來解釋這一問題的。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了一番學術上的梳理後，他指出，隨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馬克思主義史學觀也在中國史學界開始運用。在二十世紀20年代以前以胡漢民、李大釗、戴季陶等人為代表，而最多產和最有貢獻者為李大釗。不過，此時唯物史觀並沒有成為知識人的共識。但到了20年代中期，當城市群眾運動、中國社會革命化都顯現得激進的時候，無論是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還是激進的知識份子都關注社會問題，並形成了這樣一個共識：即社會變革應該是政治變革的前提。這一共識促使中國思想界發生了社會學的轉向。這一轉向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在西方，馬克思被公認為是與韋伯、涂爾幹（Émile Durkheim）並列的社會學三大創造人之一，要運用社會學理論就必然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更何況馬克思主義的要旨不僅是關注社會問題，更重要的是改造社會，

而這正是五四後中國知識界所要努力去做的、去實踐的，這樣較韋伯和涂爾幹而言，中國思想界更願意接受具有改造現實意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於此，對於這一學術思想的轉向，作者給予了相當重視，他認為正是思想界的社會學轉向，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唯物史觀通過「社會學」這一「媒介」得到了廣泛傳播，並融入中國社會思想中，形成了1920年代政治歲月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所共同認可的共用知識(頁27-31)。在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各派的成員大都是屬於這一代的知識份子。正是源於相同的思想學術理論背景，儘管各派目的指向不一，但運用的理論工具卻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何況對中國社會史進行研究討論，「歷史唯物主義，比其時任何一種歷史理論程度更甚地將社會置於歷史研究的中心」(頁5)。

《革命與歷史》所體現出的第二個有價值的新意是，它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在中國運用的複雜性與豐富性表現了相當「了解之同情」的態度。這種「同情」首先表現在對論戰各方參加者的「爭論動機和理論能力」上的同情與尊重，如前所述，參加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各派人馬，都有不同的政治傾向，李澤厚所說，這場論戰其實「主要是場政治鬥爭」，此話不假。既然是政治鬥爭，無論在論戰中還是論戰後，「你死我活」、「你謬誤我真理」式的話語激烈對抗就一直存在於各派言論之中：「將問題歸咎於理論對手的教條主義或是修正主義甚至是意識形態的不誠實，指責對手出於不可告人的政治動機而歪曲中國歷史或馬

克思主義理論，同時又堅稱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歷史的理解是絕對的真理。」(頁186) 這段話不僅概括了當時論戰各方的態度，也大體符合後來國內學術界對論戰的評介。對於這種態度和方式德里克是不認可的，但對於論戰中各派各自運用馬克思理論去分析革命、歷史，所得出不同結論而引起激烈爭論這一事實和現象，德里克卻是充滿了「同情」，在他看來，這既有他們之間不同政治傾向的原因，當中更有長期以來忽視對唯物主義的概念準確理解和把握的原因，而這些都並存於各派之中，並非只有代表國民黨反對派(或叫國民黨激進派)的「新生命派」和代表托派的「動力派」才有(頁67-68)。

觀點相異而又激烈的爭論，在德里克看來，還顯示了具有「普遍性」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在中國歷史「實際」上運用的複雜性，這也是「理論」在與「實際」相結合時所處的兩難問題：

那些把源於歐洲經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模式直接運用於中國歷史的人，要麼使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概念簡化為一些不能與中國歷史實質產生有機關聯的有名無實的範疇，要麼雖強調普遍性，卻掩蓋了中國社會發展中最顯著的一些細節。而在另一方面，那些以確定中國歷史的複雜性而見長的史學家，卻使得馬克思主義理論模式變形走樣，引致同儕嚴重質疑他們的分析是否信守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頁185)

儘管作者自己並不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具有「普遍性」，中國史學兩難困境

在德里克看來，觀點相異而又激烈的爭論，顯示了具有「普遍性」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在中國歷史「實際」上運用的複雜性，並對論戰各派充滿了「同情的了解」。他認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觀不僅創造了新的研究「範式」，而且推進了中國史學更深入和廣泛的研究。

作者否定「革命史學」，即以歷史來論證革命，在學理上是極有價值的，但是說它對革命事業「鮮有幫助」的論斷，筆者認為是難以成立的。正是對共產主義的嚮往，相信人類社會發展的正確性、科學性，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才走上革命道路，從這個角度來看，革命史學不是對於革命事業少有幫助，而是大有幫助。

的出現是「歷史唯物主義對於中國歷史的適用度的問題。」但他並沒因此就對中國史學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化給予了「無情批評」，相反評介甚高：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觀不僅創造了新的研究「範式」，而且促使了中國史學更深入和廣泛的研究（頁186）。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因革命而把歷史「革命化」的動機和行為也給了「同情之了解」：對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普世法則」的肯定是與革命激進主義的訴求相對應的，正是出於現實的革命的訴求，中國歷史也就被「革命」了——使之符合於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普世法則」。

當然，「了解之同情」並不意味着作者價值和立場上的認可。相反，他對把革命與歷史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研究意圖持否定態度。他說：「1927年，經歷了革命失敗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轉向歷史研究，試圖以此證明自己的革命出發點是正確的。結果是，史學能夠證明所有不同的革命策略的合理性。事後看來，他們顯然掉進了自己設置的同義反覆的陷阱」，即「特定的革命目標決定了歷史的闡釋，而後者又反過來使隱含於這些革命目標之中的革命行動的具體過程合法化。」顯然，這樣的「結果對於歷史研究有害，對於革命事業也鮮有幫助。」（頁205）這就是德里克的結論。為了證明這一點，德里克以革命領袖毛澤東為例。他認為，毛澤東正確革命策略「並沒有從歷史中獲益多少，毛澤東卻用它走向了勝利。」（頁205）

從《革命與歷史》一書的書名，我們也可以看出作者此書研究視野、領域和論述的重心，應該說，正是把「史學與革命」作為一種互動

的關係進行考察是本書的特色及價值所在。雖然，國內學者在研究「中國社會史論戰」時也注意到「史學與革命」的關係，但更多的是把史學置於革命之下來論述，1927年的「史學革命」只是被看作一個被動反應事件，完全從屬於政治革命；對於「史學革命」後產生的革命史學對革命的衝擊和影響則關注甚少。德里克關注到了革命史學對革命的影響，但他卻並沒有認識到它的重要性。

應該說，作者否定「革命史學」——以歷史來論證革命——在學理上是極有價值的，但是說它對革命事業「鮮有幫助」的論斷，筆者認為是難以成立的。固然，不同派別的「革命者」，用相同的理論卻都能從歷史中找到證明有利於自己的「歷史證據」，無疑是既不利於馬克思主義史學，也不利於革命事業的。但是，正如作者自己所指出的那樣，對立的派別都在使用相同的理論，即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這樣，不同的革命者雖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但卻並不影響馬克思主義史學觀的傳播，相反，學術爭論更有利於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了。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不正是有利於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事業嗎？

此外，作者說毛澤東的革命策略「沒有從歷史中獲益多少」斷語也有待商榷。毛澤東的革命理論著作中不僅充分體現出他對歷史的了解並不比他對現實的把握少，而且，在毛澤東的革命策略理論背後支撐他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史學觀。我們始終不要忘記，正是對共產主義的嚮往，相信人類社會由原始社會一步步向高級社會發展的正確性、科

學性，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才走上革命道路，才探索出一套具中國特色卻又符合這一「普遍性」歷史規律的革命策略。革命史學不是對於革命事業少有幫助，而是大有幫助，它廣泛地宣傳了馬克思主義，更重要的是它所建構的一套革命史敘事，使中國革命者、普通民眾相信了中國革命是正當的，相信中國革命是人類奔向大同世界——共產主義世界的正義事業。

儘管德里克忽視了革命史學對革命的作用，但《革命與歷史》仍是一本值得認真閱讀的著作，尤其是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時：馬克思主義是如何「佔領」中國的？共產主義是怎樣在中國取得勝利的？1927年，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人不僅在井岡山，同時也在史學界播下了革命的「星星之火」。閱讀德里克的《革命與歷史》，你會更多地了解到學術界的革命「星火」。

## 文學經典的生成及其閱讀意義

### ● 侯其強



布魯姆 (Harold Bloom) 著，江寧康譯：《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

著名學者錢谷融先生的《閒齋書簡》有一封給廣西大學唐朝教授的信，信裏錢先生談到讀書，大意是：要讀至少五十年不倒的書！每每看到坊間各領風騷幾年甚至是幾個月的主流讀物蕭蕭落下，「五十年不倒」，這實在是一個嚴苛而又實用的擇書標準。五十年裏，時間的篩子篩落了多少企圖逼近經典之門的作品，我們不由得要問：它們為甚麼會被篩落呢？這個問題的另一面則更有意思：為甚麼有些作品會被奉為經典呢？美國學者布魯姆 (Harold Bloom) 在《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以下簡稱《西方正典》，引用

為甚麼有些作品會被奉為經典呢？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中給出了一種新的思考：「在陌生性意義上而言的原創性超越其他一切品質，是能夠使一部作品成為經典的品質。」布魯姆給出「經典之為經典」的三個「關鍵詞」：陌生性、原創性、經典性。